

【古代文学的空间维度】

[主持人语]受文学史模式的影响,大部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多强调“时间维度”。“空间维度”虽然也包含在叙述之中,例如某位作家出生于何地,其文学活动在何地展开,甚至会注意到其作品和特定物理空间的关联性。但是,由于“时间维度”的主导性,“空间维度”难以得到强调和凸显,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性和立体感难免被遮蔽,文学史的本来面貌其实也难以得到真正的呈现。注重从“空间维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或许可以弥补“时间维度”描述的不足。这里所谓的“空间”,不是指文学作品中的虚构空间,而是历史上曾经真实存在的地理空间。文学史上的任何事实,都不仅在特定的时间发生,也都是在特定的空间中发生的。每一个作家都生活在一定的空间之中,他们的创作,哪怕是简单的一首绝句,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之中完成的。文学史上还有诸多的文学活动,有的活动甚至对某一时期的文学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还有文学流派和集群的活动等,它们同样是在特定的空间之中展开的。空间有大有小,大到一个行政区域,中到一处山水景观,小到一方斗室;在特定空间活动的文学家,或者个体,或者群体;有的空间催生了文学名篇,有的空间发生过影响或大或小的文学活动。伴随着文学家生活道路的变化、家国政治格局的转换,文学的空间还经常发生位移。凡此种种都说明,注重从“空间维度”开展研究,能够还原出更为丰富和立体化的文学史场景,重现更为具体的文学史的原貌,甚至能够促使文学史研究和思想史、心灵史、生活史、情感史更好地相互衔接,生发出诸多富有文化意味和生命趣味的学术命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和《文学遗产》编辑部于2015年11月主办了“空间维度的中华文学史研究”研讨会。2019年8月18日,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又举办了“时空维度与《儒林外史》研究”研讨会。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从“空间维度”的研究。这里刊出的三篇论文都是着眼于“空间维度”对问题的发现和阐释:刘英波的《大明湖:明清时期一个典型的文学空间》聚焦于明清时期大明湖这个物理空间所发生的文人雅集、吟咏等文学事件;裴雪莱的《清代戏曲家地理分布与江南戏曲文化空间》则以统计学和历史地理信息(GIS)的方法,分析和回答了清代戏曲家何以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域以及其戏曲文化空间的类型等问题;史俊超的《〈儒林外史〉地域叙事的圈层结构及相关问题考述》既着眼于作品内在的地域叙事,同时又联系吴敬梓在南京的生活,对其圈层结构做了比较深入的论析。这三篇论文讨论的对象虽然不同,但都是从“空间维度”出发的探讨。恰巧的是,它们一论诗歌,二论戏曲,三论小说,相信会为学界带来诸多的启示。(朱万曙)

大明湖:明清时期一个典型的文学空间

刘英波

【摘要】大明湖是一个风景胜地,也是一个独特的物理空间与文学空间。明清时期曾有众多的文士驻足于此,或雅集,或游赏,或应酬,他们游览美景的同时,书写了大量题咏大明湖的诗篇。这些诗篇是对不同时段大明湖这一物理空间的文学记忆,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饱含着每位作者的生命体温与精神旨趣。还原这一物理空间文学活动发生的场景,阐释诗意、体悟文字背后的文化意义,利于把握物理空间与文学活动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关键词】大明湖;明清;文士;文学空间

【作者简介】刘英波,男,山东鄄城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山东 济南 250014)。

【原文出处】《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南京),2020.1.1~8

大明湖的历史悠久。北魏年间,酈道元《水经注·济水注》曾记载:“其(泺)水北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东、北两面侧湖,此水便成净池也。”^[1]³⁰这里所说的大明湖在今五龙潭一带,非今日大明湖。六朝

时,因湖内多生莲荷,曾被称为“莲子湖”^①。隋唐时,亦称“莲子湖”,又名“历水陂”。宋代又有“西湖”之称,曾巩曾写诗句:“问吾何处避炎蒸,十顷西湖照眼明”。至金代,元好问《济南行记》^②中所称大

明湖,已专指城内湖区。明代重修城池,大明湖乃初具形貌,后历经整治,植荷栽柳,不断修建,至清代已成为闻名于世的风景胜地。对此美景,清人任宏远(历城人)曾颂赞:“济南景色异他郡,城外青山城内湖”^{[12]393}。

大明湖的水、桥、柳、荷、亭阁、画舫、洲堤、祠舍等,共同建构了一个独特静谧的自然、人文空间,它既有优美的自然风光,也蕴载着丰富幽妙的人文故事。大明湖独有的物理空间与人文信息吸引着各类人士汇聚于此。其中,本地或周边地区的士人常游赏宴集于此,游历山东的宦宦、文士也常把此地作为游赏、交游的重要场所。此处的美景与故事往往引起士人们浮想翩翩,燃起创作的激情,那些流传至今的佳篇便成了大明湖的文学记忆,如曾巩的《西湖》《西湖纳凉》、苏辙的《西湖二咏》、《和李诚之待制燕别西湖》、元好问的《泛舟大明湖,待杜子不至》、张养浩的《大明湖》等。这些篇章是独特“物理空间与他们的生命、情感融为一体”的佳构,“跃动着文学家的心跳,可以触摸到他们的体温”^[13],也彰显出了他们不同的生命情趣。据统计,除去咏写大明湖上历下亭、北渚亭、天心水面亭、鹊华桥、会波桥、北极庙、会波楼、超然楼等景观的诗作外,明清时期直接吟咏大明湖的诗作就有1000多首,其中以清人的诗作居多。本文试以明清文士咏写大明湖的诗篇作为考察对象,赏鉴他们笔下大明湖的形象,探究在此空间产生的文字背后的生命情态与精神指向。

一、大明湖雅集:文士的文学活动

水波潋滟、烟蒲松软、娇柳雅荷、寒桥孤亭等不同的景物、景观建构了大明湖独有的物理空间。因其独特,所以常常吸引众多文士倾慕前往。雅集觞咏是文士们常常汇聚于此的主要形式,也是他们不同于常人的一种生命存在方式的展现。他们置身此境,开怀引觞,谈古论今,赋诗作文,抒情写意,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充满雅韵、饱含体温的名篇佳作,而这些作品也成了我们体悟时人情怀与探究当时文化风貌的重要史料。

(一)秋柳社集。在众多雅集活动中,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秋八月,王士禛等诸名士云集大明湖畔,举行秋柳社集之事最为知名。据《渔洋山人自撰年谱》所记,当时参加此次聚会活动的人员有:“二东名士如东武邱海石石常、清源柳公廕焘、任城杨圣宜通

久兄弟(圣喻通睿、圣企通俊、圣美通俶)、益都孙仲儒宝侗辈咸集。”^{[14]3-14}这里就上述人员略做介绍:

邱石常,字子廩,号海石,山东诸城人。器宇俊伟,常往来江淮吴越间,所交多奇士。以岁贡授夏津训导,后升高要知县,王士禛赠诗坚其行,竟不赴。卒年五十七岁。^③

柳焘,字公廕,号八愚,山东临清人。顺治八年辛卯(1651)举人。精书法,工诗词。为司寇王士正(禛)所推重,相订结秋柳社。^④

杨通久,字圣宜,号武崑,山东济宁人。素尚气节,英敏博学。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以母老不出。顺治十六年冬,始授直隶献县知县。因不满官吏的恣睢谩侮,到任四十日愤懑而死,年三十五岁。

杨通睿,字圣喻,山东济宁人。与弟通久、通俊、通俶、通佺并擅才华,号“五杨”。有《鹤原集》。

杨通俊,字圣企,号樗庵,山东济宁人。康熙十四年(1675)以贡生官蓬萊教谕。课士有方,谢任归,闭户著书,年七十九犹好学不倦,著有《烟霞记游》等。

杨通俶,字圣美,通久弟。^⑤

孙宝侗,字仲愚,山东益都人。诸生。有才气,善诗文。王士禛称其:尔雅深厚,不羸不佻。以父(孙廷铨)荫当得督察院经历,不赴。著有《惇裕堂集》。^⑥

由以上小传,我们可知参与社集活动的人员均为山东名士,且均是青年才俊。据王士禛当时所写《社集明湖即席赋送圣企、圣美还济宁,兼寄圣宜》二首,又可获知此次雅集活动有一个主题——送杨氏兄弟回济宁。如其中的第二首:

明湖秋社雅游频,何异兰亭禊暮春。杖策偶来招隐士,临流翻欲送归人。柳生对酒歌成雪(公廕),丘子谭诗笔有神(海石)。归遇中郎相问讯,十年此会足沾巾(圣宜)。^{[15]51}

在这里,首联明确交代明湖秋社雅集活动较为频繁,且把他们的雅会与王羲之等人组织的兰亭修禊活动相并论,以穿越时空的比较显其欢愉的心情;颌联借用左思《招隐诗》“杖策招隐士”赞写杨氏兄弟高雅脱俗的品格,“送归人”则点出了雅集的主题;接着,颈联以比喻的手法直接赞美柳焘、丘石常的诗作,尾联表达了对杨氏兄弟中未能参与雅集者杨通佺^⑦的问候,同时以“十年此会足沾巾”书写朋友间值

得珍惜的深情厚谊。此作从一个层面记写了文士文学与交往活动的特点,也丰富了大明湖这一物理空间的人文情怀。

可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令秋柳社雅集闻名于时且流播久远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些年轻名士的参与,也不是因王士禛咏写了送别类的诗作,而是王士禛在雅集期间创作的四首《咏秋柳》诗。对此,王士禛在《菜根堂诗集序》中曾有较为详实地记述:

顺治丁酉秋,予客济南,时正秋赋,诸名士云集明湖。一日会饮水面亭,亭下杨柳十余株,披拂水际,绰约近人。叶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态。予怅然有感,赋诗四章,一时和者数十人。又三年,予至广陵,则四诗流传已久,大江南北合者益众。于是秋柳诗,为艺苑口实矣。^{[5]2004-2005}

王士禛以追忆且稍有得意的口吻撰写了这段文字,其中交代了创作“秋柳诗”的时令与原因,以及“一时和者数十人”的情形,发展至后来,“大江南北合作益众”,以至成为“艺苑口实”。譬如,时人徐夜、王士禄、曹溶、朱彝尊、冒襄、陈维裕、汪懋麟、陈维崧、苏世璋等,稍晚的屈复、郑镜蓉、彭启丰、钱维城、郑炎等均有唱和。后人咏明湖秋柳时,还屡屡提到王士禛咏秋柳的故实,如杨恩祺的《明湖秋柳》、宋翔凤的《大明湖柳》、郝治恭的《明湖秋柳》、鲍瑞骏的《明湖秋柳》等诗作。而且,不仅有大量文士的积极唱和,还曾出现了《秋柳诗》多种历史文化意义上的阐释,甚至存有不少揣测、附会之词,引发后人的不断解读,如屈复《王渔洋秋柳诗四首解》、李兆元《渔洋山人秋柳诗笺》、郑鸿《渔洋秋柳诗笺注析解》、王祖源《渔洋山人秋柳诗笺注》、高丙谋《渔洋秋柳诗释》、徐寿基《渔洋秋柳诗注》等。^⑧之所以,“秋柳诗”受到如此多的关注,主要是诗中让人读出了“故国之思”“盛衰之感”,给“那些不再视自己为明人,而是清人的文人们,提供了一个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空间”^[6],而且这种“把社会所期待和正在探索的新的美适当地具体化了的东西”^{[7]342},较好地配合了时代审美、政治文化、个人精神等方面的需要。一次雅集,四首诗作,竟然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除了时代、文运、文人等因素之外,我们不可忽视大明湖这一具体的物理空间。由于这个物理空间特殊时节氛围的渲染与具体物象——秋柳的启思,才使王士禛创作了这四首响彻南北的诗作,而这四首诗的广泛传播、不

同诠释、深远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大明湖及其秋柳新的人文情怀与文化内涵,也使大明湖与秋柳具有了耐人寻味的精神性特征。

(二)鸥社雅集。大明湖作为一个公共物理空间,一个融自然、人文于一体的胜地,吸引众多文士来此游览吟咏,相较于上文所举新城、济宁、益都等州县文士雅集大明湖的活动而言,历城县本土文士更是近水楼台,他们把大明湖、千佛山等景区当成自己的后花园,并组成诗社频繁来此游赏、吟咏。这里以鸥社为例,见其一斑。

今人据有关史料和诗社成员的诗作考析,鸥社约嘉庆中期结社于大明湖上,前期成员有翟凝、李肇庆、范垌、周奕夔、李佃、周乐、乔岳、谢焜、何邻泉、徐子威、郑云龙等十一人。嘉庆二十四年后渐渐消歇,道光二十二年恢复诗社活动,又有王德容、马国翰、朱诵泗、李纬、彭焦山等人加入其中。道光三十年后,诗社逐渐衰落。^⑨结社期间,他们每逢“春秋佳日,互为主宾,吟咏倡和,欢洽永日”^{[8]594},足迹遍及济南名胜之区,曾写有许多宴集吟咏于大明湖上的诗作。如王德容的《(道光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李秋屏招聚湖上,竹吾(马国翰)时已赴秦,赋以志感》、马国翰的《(道光二十二年)花朝日偕周二南(乐)、王秋桥(体涵)、谢问山(焜)、朱退旃(诵泗)、李秋屏、彭蕉山泛舟明湖即事四首》《竹醉日为我初度,鸥社诸君以诗见惠,闲日集饮湖上,始知朱退旃先生与余生同日,赋此代祝,并酬诸君意》等。当时,何邻泉因故未能参加花朝日的社友聚会,还写了《和马词溪(马国翰)刺史花朝招鸥社友泛湖》,以“选胜湖亭成雅会,偏余孤负此花期”记写雅会、表示未能赴会的遗憾。

鸥社成员皆为同乡好友,身份多是诸生,也有少数知县类的基层官员。在诗歌创作上,他们继承同乡——明人边贡、李攀龙的诗风,尤其尊推杜甫。从他们在大明湖雅集时创作的诗来看,多为闲暇之时,他们畅游于湖亭之间,通过饮酒赋诗书写“喜谢风尘扰,追随杖履闲”“畅怀拼一醉,心契白鸥闲”^{[9]274}的闲雅情怀。此类文人群体的出现以及在大明湖上的文学活动,虽然没有王士禛等雅集时所作《秋柳诗》影响那么大,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清代基层文人的生存方式与雅集活动特点的窗口,从而帮助我们认识他们眼里与笔下的大明湖,体悟其诗作中的生命体温与精神旨趣,认识物理空间与文学创作之间

双向互益的关系。另如,清人朱晔《与周二南、谢问山、王秋桥、何岱麓、马竹吾、李秋屏、朱退旃湖上宴集》中“兴阑人未倦”,朱崇勋《明湖修禊》中“今日成佳会”“觞咏幽情畅”,吴升《三月十三日大明湖修禊四十韵》中“高会亦寻盟”“迟留欲忘倦”等,均记写了文士们雅集、高会于大明湖时的觞咏情兴,他们因湖起事、与友宴集、情满湖上,达到了情景交融的效果,为我们关照物理空间与文学活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素材。

二、大明湖独游:同一空间中的独有情思

面对同一物理空间的景致,因每位文士的成长经历、思想情怀及所处境遇等方面的差异,会使他们产生不同的感受,在他们各自的诗作中便会表达出不同的思想情感,展现出不同的审美情趣。这里以明清文人独游大明湖时创作的诗作为例,一探究竟。譬如,清人李湄《癸巳明湖感旧》:

疏柳衰荷送晚秋,十年前客又重游。归心迢递海边路,病骨支离湖上舟。诗酒狂名悲落魄,交游浪迹等浮沤。茶寮酒肆谁相识,一片笙歌起暮愁。^{[10]76}

李湄,字潜庵,胶州人,康熙年间辛卯举人。他学问淹博,善诗词,工书法,著有《碧莲堂诗集》。由诗题中的“癸巳”知此诗写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首联交代李湄在康熙五十二年晚秋游于大明湖上,并说明此乃十年后的重游。其中“疏柳衰荷送晚秋”不仅点明季令,也铺垫了整首诗的感情基调。由于李湄作为客者重游大明湖,故有“归心迢递”的思乡情绪,加之“病骨支离”年岁已高,在此境况下故地重游难免会引起唏嘘感伤。于是,基于前两联的渲染,颈联中的“诗酒狂名悲落魄,交游浪迹等浮沤”便是他历经人世沧桑变化后,反思过去的轻狂浪迹,面对现实的落魄衰老,抒发了像“浮沤”一样变化无常的人生感叹,内里含有许多感伤与无奈。尾联,写旁边的茶寮酒肆已非昨日容貌,也不知换了几家店主,让人倍感陌生,远处的一片笙歌反而增添了自己的悲愁。该诗以“明湖感旧”为题,仅用少量笔墨记写当时的明湖境况:疏柳衰荷、茶寮酒肆、一片笙歌,而更多笔墨呈现出的是感叹人世变迁、物非人非的悲怀。此时,李湄眼中的大明湖已与他当时的境况、心情融为一体,其中采用时空变换方式的书写,达到了物我、内外两相关照融合的审美效果,其中所表达的

感伤情怀既有个体特点,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又如何绍基(1799-1873)的《独游明湖》二首:

芦花风里快扬舸,金碧新装古历亭。制就沧江渔父曲,晚凉唱与白鸥听。

无端激电拱□□,特沛狂霖万物醒。入夜雨声偏蕴藉,丝丝引入梦中听。^{[11]212}

据钱松《何绍基年谱长编及书法研究》^⑩考述,咸丰五年(1855)四月何绍基受谗言所害,降职辞官,于咸丰五年六月交印黄宗汉。随后,他接受山东巡抚崇恩聘请主讲山东泺源书院,于咸丰六年(1856)七月来到济南,直到咸丰十年九月离开济南南返。因此,我们认为这两首小诗应作于咸丰六年七月至咸丰十年(1860)间的某年秋季。由两首诗作的设景来看,写秋季芦花风里的小船、金辉下的历下亭,突然而至的大雨,以及入夜后蕴藉的雨声等,为我们构设出了两个相对清雅的画面。由诗中趁晚凉吟唱渔父曲与白鸥的对话,以及能有相对安静的心绪聆听窗外的绵绵细雨,表明何绍基此时的心情较为闲适,可与白鸥对话、夜雨入梦又给人有点清冷、孤独的感觉,这应与“独游”有关,先前降职辞官的隐痛也似乎有所流露,与上文李湄诗作中的悲愁情绪有所不同。由此可见,李湄、何绍基同是秋季游赏大明湖,在物理空间相对没变的情况下,其眼中的物象却因自身的情怀、经历以及创作的出发点与关注点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所以在遣词造句、设景造境、表情达意方面也多有差异。再如张之洞(1837-1909)的《湖上散步》:

研帽轻衫入早春,寻芳何用出城闾。丰茸烟草明徐雪,清浅湖流动绿蘋。漱浣重怀元好问,歌诗谁继李于鳞。环波胜地无人识,只有渔郎下钓纶。^{[12]75}

据吴剑杰编著的《张之洞年谱长编》所录,咸丰十年(1860)八月英法联军陷北京,咸丰帝狩热河。张之洞感愤时变,作诗《海上》二首以抒激愤。并于当年秋冬之间,他到济南入巡抚文煜的幕府。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他以济南卑湿,苦患脚气,归南皮。^⑪在济南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张之洞创作了不少诗作,而这首《湖上散步》极有可能创作于咸丰十一年春。此时,张之洞二十三岁,虽然还未考中进士,没有正式进入仕途,但是先前顺利通过县试、乡试已见其才能,因此这时的张之洞对未来是充满希冀的,所以来到文煜幕府锻炼自己。从诗作来看,写自己

在早春时节,研帽轻衫寻芳明湖。“寻芳何用出城闾”是说此处春意浓浓,无须出城寻春,所以接下来的“丰茸烟草明馥雪,清浅湖流动绿蘋”,便是描绘早春大明湖的美景,从而渲染、创设出的是一种清雅之境。随后,忽然忆起金人元好问的济南之行,叹息明人李攀龙的诗风后继无人。转而,又叹写眼前的胜地美景无人识,唯见渔郎下钓纶。整体而论,在此首诗中,我们看不到当时时事巨变的痕迹,其中的绘景、抒情使人有点诗题中“散步”一样的轻松,这应与诗题与写作目有关;不过,其中用元好问、李攀龙的故事,除了两人与大明湖(济南)有关联之外,也有借此表达对人世命运的感叹,以及蕴有他在当时境况下微妙情思的些许寄寓。

综上三例,大明湖的物理空间给他们提供了游赏的客观存在,由于每个人的经历、才情以及写作时的境况与写作目的不同,因此也就使他们在各自诗中,对大明湖自然景观、人文景致的着墨多少不同,所表达的思想情怀也存有差异。因此,物理空间的存在提供了文士文学活动空间,也为其创作提供了关照摹写的物象,而作品则以不同的审美形式延展、诠释着此类空间,并赋以丰富的文化信息、思想情感与精神指向,从而增添了此类空间文学活动与生命情趣的丰富性。

三、大明湖应酬:宦官文士交游活动的空间

作为一个集自然、人文于一体的物理空间,大明湖给人们提供了多种可能的活动空间,如前文的雅集、独游,同时它也是一些宦官文士交游的理想场所。《水经注》云:“州僚宾燕,公私多萃其上。”^[1130]便说明了大明湖的这种社会功用。他们在此地游赏宴饮,迎来送往,谈天说地,议论时事,臧否人物,诉说情怀。

本地致仕宦官招游来山东任职的官员者,如王慎中的《刘函山招游大明湖》:

轻舟恣所往,适趣何必深。居然在城郭,而得混鱼禽。翠岫远衔席,绿波清照襟。明湖既得性,芳岁亦娱心。暮景媚涵水,春风吹满林。岸木稍变色,汀草微生阴。浩荡纷言笑,满盈递酌斟。不能日日至,勿云乐太湛。^[1310]

刘天民(1486-1541),字希尹,号函山,山东历城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官至按察副使,嘉靖乙未年

(1535)被罢官后闲居乡里。王慎中(1509-1559),字道思,号南江、遵岩居士,福建晋江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官至河南参政。嘉靖十五年(1536)四月,王慎中被任命山东提学僉事,任命后他曾回家一段时间,才到任山东,嘉靖十七年(1538)戊戌二月升任江西布政使左参议,因此王慎中的这首诗当作于丁酉年(1537)春。^⑩从整首诗来看,其中并无深意,乃是在描写春天大明湖“翠岫远衔席,绿波清照襟”自然美景的基础上,记写“浩荡纷言笑,满盈递酌斟”的活动场面,书写“适趣”“得性”“娱心”的高兴情怀,使描绘自然景致与表达欢愉情怀较好地融合在了一起。另外,刘天民《函山先生集》中有《喜南江王子来督学政次陈石亭侍讲韵二首》《八月八日周石崖、王在庵、王南江偶集湖上涟漪阁,晚复小泛分韵各赋二首》等诗,王慎中《遵岩集》中还有《游大明湖晚至北极庙登览》《刘函山获田庄居久不至城诗以问之二首》《刘函山田庄宴集同顾雍里三首》等诗作,由此可知二人在此期间的交往比较频繁,游赏大明湖的活动也远非一次。这些作品的存世记述了两人的交往活动,承载着二人的深厚友谊,也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大明湖的情感温度。

外地来山东任职宦官招友游于湖上者,如施闰章的《同严子餐给谏、李君渥枢部泛明湖》:

落日扁舟野兴长,繁弦急管倚筵张。回波荷芰馀零乱,曲浦亭台接淼茫。海内词人从二仲,客中佳节近重阳。东藩皂盖传高会,此地风流尚未央。^[14704]

施闰章(1618-1683),字尚白,号愚山,安徽宣城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官至侍读学士。顺治十三年(1556)至十七年(1660),他曾任山东提督学政。严沆(1617-1678),字子餐,号灏亭,浙江余杭(今杭州)人,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施闰章《施愚山诗集》卷十六有《约突泉送严子餐都谏北还》。李世洽(1622-1676),字溉林,又字君渥,河北束鹿(今辛集)人,顺治丁亥(1647)进士,丁酉(1657)典山左诗,齐鲁人文翕然不变,不久升任山东督粮道参议。结合三人的经历,可知此首诗应作于施闰章在山东任职期间的某年秋季。与上面王慎中的诗作相比,此诗也没有多少深意,仅是记写重阳节前夕三人泛舟湖上的宴集之事,并借此抒写野兴闲适之趣。荷芰零乱、秋水淼茫非但没有使他们野兴消退,反

而在尾联中化用杜甫《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中的“东藩驻皂盖”诗句，张显其高会风流之名。前文王慎中的诗写明湖春景，此诗写明湖秋景，同有适意的闲趣抒写，但前者抒情成分稍淡于后者，呈现出了二者的同与不同，从而丰富了同类作品中不同生命情趣的多元存在。类似作品，又如陆棻(1630-1699)的《与同年卢西亭太史泛舟明湖，有怀钱葆芬、朱锡鬯》^⑩、邹弢的《与山东抚署同人游大明湖》^⑪等，不再赘述。

时任山东宦与好友钱别湖上者，如清人孙星衍的《明湖钱别》：

历城满地伏涕泉，大明湖在城中间。鹤华照影秀欲绝，芦蒲拂浪鸣儻然。行厨草草非难致，半日开筵坐萧寺。地胜看山忆故山，心清省事如无事。曼卿天人谪世闲，判笔不抵民情妍。藩条一揽等失马，蓬岛再入同登仙。周郎清兴蒋生笔，且共尊前会真率。陈君且莫问三空，京兆只宜留五日。^{[15]642-643}

孙星衍在该诗的小序中云：“嘉庆丁卯(1807)岁夏六月，权藩至历下，与石廉使(韞玉)交替，偕周通守(世锦)、周大令(雋)、蒋少府(因培)钱别于惠泉寺，寺临大明湖，在历下亭之东，山光水色殊为胜境，各为诗纪事云。”^⑫这里交代了赋诗时间嘉庆十二年(1807)丁卯夏六月，事由是石韞玉被弹劾革职，接替石韞玉的官员已到济南，孙星衍等人于大明湖给石氏钱别，参加人员有石韞玉、孙星衍、周世锦、周雋、蒋因培五人。从整首诗来看，前两联写历城泉水、明湖位置、鹤华桥、芦蒲与湖水等景致；随后，以“行厨”两句记写钱别之事，其中的“草草”说其匆忙，“半日”“萧寺”则含有对朋友的留恋与稍有低落的情绪；“地胜看山忆故山”化用唐人韦应物“故山可往薇可采”言说石韞玉的气节，“心清省事如无事”则说明一种境界，颇富禅意；“曼卿”两句借用宋人石延年(字曼卿)写石韞玉的跌宕气节与好剧饮的风范，虽有“判笔”之才但也不抵他人诬告；“藩条”两句说石韞玉作为地方长官经此塞翁失马之事，反而给大家再次一起论道登仙提供了机会，实为安慰之句；接着，写周雋诗之“清兴”，蒋因培诗妙笔生花，共同谱写了朋友间的“真率”情谊；最后，建议大家莫说“三空”之味，用汉人张敞之典说明石韞玉与大家在一起的时日不多，希望大家珍惜眼前相聚的时光。与上两首诗相比，

因孙星衍咏写主题的变化，诗中的情感浓郁、复杂了许多。

综之，大明湖为各级宦文人的交游活动提供了具体的物理空间，在这里发生的游赏、宴饮活动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友谊，激发了他们的创作动机，也促使了大量应酬类作品的产生。虽然这些作品没有深刻的思想旨趣，但作为文人生活方式中常见的一种形式存在，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当然也在一定层面丰富了此地的人文情怀与文化信息。

四、家人同游大明湖：亲情的书写

每个人因身份地位不同，往往扮演不同的角色，参与不同的社会与私人活动，如朋友的雅集、宦的交往、师生同年的交际、家人的聚集等。由于每个人交往或聚集的对象不同，会使他的心理预期、心理感受以及交往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别，因此当他们把参加某类活动的深刻感受付诸文字时，其使用的笔法与表达的情感也各有不同。譬如，记写与家人一起游赏大明湖，便与上文所举朋友之间游赏大明湖的活动多有不同。如张廷玉的《随八叔父游大明湖，时同往者兄笃山、义峰、荆山，弟荣怀、抡闻、奉律、思斋，姪若熾、若潭、若震、若峒，姪孙鸿楫，姪曾孙裕熙》：

大明湖水阔，近在历隅。皎洁银花镜，空明碧玉壶。孤亭倚风柳，双桨入烟蒲。往事频回首，相看涕泪俱。^{[16]74}

从诗题看出，此作是张廷玉(1672-1755)与家人一起游赏大明湖时所作。由参与游赏活动人员的身份，尤其是有其侄孙、侄曾孙参加，我们认为此诗应作于张廷玉晚年。再有诗句“往事频回首，相看涕泪俱”，结合《张廷玉年谱》^⑬所记自乾隆十四年(1749)起，张廷玉因请归、配享等事与乾隆帝发生矛盾，后被允许致仕回乡，故这首诗极有可能是张廷玉乾隆十五年四月南还途中路过济南时所作。诗作前三联咏写大明湖的景致，其中“水阔”与“城隅”对，“皎洁”与“空名”对，“孤亭”与“双桨”对，共同创设出两两相反的审美张力，尤其是“隅”“空”“孤”三字与水、风、柳、船、亭、蒲等物象，整体勾勒出一幅较为“清冷”的画面与氛围。结合该诗的写作背景，细察“隅”“空”“孤”三字的隐喻之意，可以帮助我们体悟张廷玉当时的处境与孤苦的内心。随后，尾联便是作者集聚

多时的孤苦、恐惧、失落等复杂情感的发泄：回首往日历任三朝的荣光，面对近年的突变与帝王的权威，以及一些同事的发难，唯有与家人相聚，才能够涕泪以对，将内心的苦闷倾诉出来。又如清人邵亨豫的《携儿女泛舟明湖仍用前韵》：

三年剧寇影相亲，鸿爪重寻未了因。诗酒有情联旧雨，湖山含笑迓归人。满天烽火回头远，大野烟云到眼新。稚子欢颜僮仆喜，浮家从此换轻。^{[17]106}

邵亨豫(1817-1883)，字汴生，江苏常熟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官至吏、户、礼部侍郎。结合邵亨豫的生平经历、当时的历史事实，以及俞樾《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吏部左侍郎邵公墓志铭》所云：“未几，闻英吉利寇京师，天子幸热河，益感愤，遂得疾，其年十月以疾乞归。迂道由江西、湖北、河南至山东之文登，乐其僻远，有终焉之志。明年同治建元(1862)，毅皇帝登基，皇太后训政。”^{[18]650-651}我们认为此首诗极有可能是邵亨豫“以疾乞归”，于1861年间去山东文登路上过济南时所作。整体关照，诗中表达出了一种乞归后的轻松与欢愉。但是，由“三年剧寇影相亲”“满天烽火回头远”诗句，使我们联想到当时英法侵略、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帝逃避热河等屈辱、混乱的历史事实，联想到一个积弱积贫、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志士受厄的时代，再结合诗中“未了因”“联旧雨”“浮家”等词语，以及邵亨豫同治二年(1863)上疏言吏治、整饬军旅、慎行捐纳、接任国子监祭酒的积极举动，我们认为看似邵亨豫当时持有“湖山含笑迓归人”“浮家从此换轻”的轻松心态，其实是一时的、短暂的表现，其内心仍然怀有强烈的济世报国情怀。

张廷玉、邵亨豫的这两首诗作使我们感受到了与前面游赏诗作中不同的大明湖，体悟到了其中蕴含的历史厚度与真实情感，“或许(它们)并不具有改变文学史走向的意义，但可能是古代文学家们的一次心灵的碰撞，甚或体现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心态”^[19]，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与意义。

另如，唱和之作，如清人毛大瀛的《和陈廷斐明湖泛月因登北极阁即事二首》；怀古之作，如清人朱定元的《大明湖怀古》；节日游赏之作，如清人李之雍的《七夕游大明湖》等，也在一定层面丰富了大明湖上的文学活动。再有，清人张荫桓(1837-1900)的纪

事诗《大明湖观水雷歌》^①，场面宏阔，题材新颖，相较于上面的诗作，该诗具有近代气息与进步思想，为大明湖这一物理空间增添了新的文化信息与文学情怀。

概言之，明清时期的大明湖是一处独特的物理空间，因为各类文士常雅集、游赏于此，且伴随着各具特点的文学活动，故使它蕴载了丰富的文化信息、文学情怀与生命情趣。就此物理空间与文学活动的关系而言，由于不同时节(四季)，甚至不同时段(早中晚)，大明湖的景致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其中的水、柳、荷、亭等物象也会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状貌，因此它们使作者形成的感受也就各不相同；从作者的角度而言，他们的经历、性情、喜好各有差异，游赏大明湖的目的、伴游对象不尽相同，甚至游赏大明湖那一段的情绪变化也各有不同等。然而，正是这些变化与不同，才使文士们创作出了大量文采各异的篇章，建构出了一个各具特点的文本空间，等待着我们去解读认识。我们只有尽量还原、认知每个自然物象与个体生命的存在形态，充分认识物理空间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结合相关语料细察文本中的话外、话内之音，才能使我们较好地体悟每篇文字所融入的生活情趣与生命体温，进而领悟文字背后的精神指向。正如法国亨利·列斐伏尔批判的那样：空间绝非只是一个准备着被“内容”填充的“容器”，而是因为人类生命情感的投射与塑铸而具有不同形态与意义。^{[20]328}明清文士笔下的大明湖则很好地诠释了这句话的意旨。

注释：

①[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一《广知》：“历城北二里有莲子湖，周环二十里，湖中多莲花，红绿间明，乍疑濯锦。又渔船掩映，罢罟疏布，远望之者，若蛛网浮杯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②[金]元好问：《济南行记》：“至济南，辅之与同官权国器置酒历下亭故基。……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其源出于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红绿如绣，令人渺然有吴儿州渚之想。”(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元好问全集(增订本)》，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13页)

③[清]宫懋让等修，李文藻等纂：《诸城县志》志三十六，乾隆二十九年(1764)刊本；[清]毛永柏修，李图、刘耀椿纂：《咸丰青州府志》卷四十六，咸丰九年(1859)刻本。

④[清]张度、邓希曾修,朱钟纂:《临清直隶州志》卷八上“人物”,乾隆五十年(1785)刻本。

⑤有关杨通久、杨通睿、杨通俊、杨通俶的情况,参阅[清]徐宗幹纂修,汪承镛等续修:《咸丰济宁直隶州志》卷八“人物三”,咸丰七年(1857)刊本;李恒法、解华英编著:《济宁历代墓志铭·献县知县杨通久墓志铭》,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228-231页。

⑥[清]毛永柏修,李图、刘耀椿纂:《咸丰青州府志》卷四十六,咸丰九年(1859)刻本。

⑦杨通佺,字圣期,山东济宁人。康熙初年贡生,官合肥县教谕。著有《竹西词》。

⑧参阅伦明:《渔洋山人著书考》,《燕京学报》1929年第5期,第925-927页;薛顺雄:《王士禛著作考》,《东海学报》1969年第1期,第101-103页。

⑨赵晨:《清代中期济南诗社鸥社及其祭祀杜甫活动初探》,《菏泽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39-43页。

⑩钱松:《何绍基年谱长编及书法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60-207页。

⑪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4页。

⑫王文荣:《王慎中年谱》,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1-35页。

⑬陆棻,字次友,浙江平湖人,康熙六年进士,十八年举博学鸿词科,授编修;卢西宁,名琦,字景韩,浙江仁和人,与陆棻同为康熙六年进士;钱芳标,字葆芬,上海华亭(今上海市)人,清代词人,康熙五年举人;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与陆棻为中表弟,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除翰林院检讨。

⑭邹弢(1850-1931),字翰飞,号酒丐,江苏无锡人。光绪十四年(1888)应山东巡抚张朗斋之请,到淄川矿山任职,此诗可能创作于此时。(参见萧相恺:《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30页。)

⑮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阳湖县(今常州市区)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殿试榜眼。嘉庆九年(1804)二月至嘉庆十六年(1811)七月,官山东督粮道;石韞玉(1756-1837),字执如,号琢堂,江苏吴县人。嘉庆十一年(1806)年五月擢山东按察使,嘉庆十二年(1807)六月,因与刑部侍郎广兴等有隙,被劾革职,嘉庆帝念旧劳赏编修,不久辞官;周世锦,字素夫,湖南桂阳人,廪贡生,学博才优。官山东盐运判。宦数十年,有正声,善书法;周雋,字曼亭,元和人,举人。曾任黄县(今烟台龙口市)知县;蒋因培,字伯生,常熟人,诸生。嘉庆二年(1797)援例授阳谷县丞,历知滕县、汶上、泰安、齐河诸县。

⑯张体云:《张廷玉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11-325页。

⑰[清]张荫桓:《铁画楼诗钞》卷二,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3册),上海古籍出版2010年版,第755页。

参考文献:

[1][北魏]酈道元原注,陈桥驿注释.水经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2][清]任宏远.明湖杂咏[M]/刘玉民.济南文学大系·古代诗歌卷.济南:济南出版社,2015.

[3]朱万曙.小玲珑山馆:一个“有意味”的文学空间[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6):20-29.

[4][清]王士禛撰,孙言诚点校.王士禛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2.

[5][清]王士禛.王士禛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7.

[6]李国文.文人的江湖[J].文学自由谈,2013(5):4-16.

[7][日]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

[8][清]王德容.秋桥诗续选[M]/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第35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9][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诗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8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0][清]张鹏展.国朝山左诗续钞[M]/山东文献集成第一辑(第42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11][清]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2][清]张之洞著,庞竖校点.张之洞诗文集(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3][明]王慎中.遵岩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4][清]施闰章.学馥堂诗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5][清]孙星衍.孙渊如先生全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47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6][清]张廷玉.澄怀园诗选[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7][清]邵亨豫.愿学堂诗存[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7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8][清]俞樾.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吏部左侍郎邵公墓志铭[M]/缪荃孙.续碑传集(清代传记丛刊第115册).台北:明文书局,1986.

[19]朱万曙.空间维度与中华文学史的研究[J].民族文学研究,2016(4):84-91.

[20]梅新林,葛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